

九龍東立法會選情再起波瀾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政改方案通過後，全港將增加五個分區直選議席，按人口增減預計九龍東將會增加一席。這一席引來反對派各陣營磨擦擦掌，民主黨的李華明向傳媒表示將不會尋求連任，而積極培養民主黨第二梯隊兼「支聯會」常委李耀基接棒，但民主黨高層卻屬意區內票王胡志偉，究竟誰會獲「祝福」，恐怕仍有不少暗鬥；而據報黃毓民欲跳區到九龍東狙擊陶君行，以報掃地出門之仇；梁家傑在九龍東又去留兩難。現在看來，九龍東將會是今屆立法會選舉中變數最大、競爭最激烈的選區，只要建制派配票得宜，也有機會一爭長短。

農曆新年期間，各政治人物都會慣常邀請傳媒聚聚，詳談來年的政治形勢及選舉部署。其中過去被視為選情最平淡，幾乎每屆都是建制派與反對派二分天下的九龍東選區，今屆立法會選舉似乎出現不少變化。

新增一席 各黨垂涎

政改方案通過後，全港將增加五個分區直選議席，按人口增減預計九龍東將會增加一席，變成五席。與其他選區相比，建制派及反對派在九龍東的基本盤相當平均，大約是5對5或4.5對5.5之比，反對派略佔優勢，所以在過去4個議席時都是兩派平分兩席，假如有5個議席，多出一的一席則很大機會是反對派的囊中物，如04年鄭經翰為反對派拿下第5席。由於九龍東這種超穩定結構，兩派都對基本盤心裡有數，變極有限亂極有限，要推動第二梯隊立法會作出全局性的變陣時，自然傾向在九龍東上打主意。

因此，這不難理解為什麼反對派今屆在九龍東的選戰部署作出了不少轉變，首先是盤踞區內多年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決定交棒，並指定其親信李耀基接班，當中既有安插親信考慮，也有排擠胡志偉的圖謀。李華明作為民主黨九龍東的領軍人物，但近年幾屆選舉都受到胡志偉挑戰，要取而代。胡志偉自以為是區議會票王，也是司徒華的指定接班人，但多年來一直在李華明之下，在民主黨力取一席之下難有出頭日，所以不斷攻擊李華明的大佬文化，迫使民主黨派兩隊出戰，但最終胡志偉也低票落選。現在李華明想退下來，論資歷能力也應由胡接任上，怎能由一個連區議員也選不上的新人接班呢？李華明明顯有私心。

然而，此舉卻與領導層存在分歧，何俊仁等人自然希望胡志偉這個第二梯隊的代表人物接上，以示梯隊有上位希望。在兩方堅持下，民主黨可能仍會以兩派出選，但當中的配票保才保是關鍵，惟涉及不少難以預料的內幕，最終是突破取得兩席，或是因配票不均而兩席皆失，對民主黨都是極大考驗。

反對派各懷鬼胎

另一方面，在分裂鬧劇後元氣大傷的社民連，其主席陶君行將會屢敗屢戰繼續出選，但問題是與黃毓民、陳偉業一刀兩斷後，肯定流失不少憤青票，而事件上其領導無能、屢屢醜聞的表現，也會影響其在選民的形象，要取得新增一席已是不易。而據報黃毓民正打算跨區狙擊陶君行，此舉並非沒有道理，一方面黃毓民恨陶入骨，要打擊他最好就是阻止他進入立法會，之後利用陶敗選的藉口在黨內發動新一輪「倒陶」，將陶拉下馬之後順勢回朝；另一方面黃毓民在九龍西勢力穩固，他如果跳區出選可將九龍西議席讓給「維園阿哥」、李偉儀等親信接棒，而他則全力整合九龍東的激進票源，重施其死咬盟友的策略，未嘗沒有機會取得一席，屆時他在九龍東西各有一席，加上陳偉業在新界西又能順利當選，他便重新掌握三席，重組新社民連也未嘗不可，狙擊陶君行實質是經過深思熟慮。

而公民黨方面，余若薇早已多次表示不願再選，而港島作為公民黨的根據地不容有失，最好自然由黨主席梁家傑回來與陳淑莊謀取兩席，但問題是梁家傑留下的九龍東卻沒有適當人選，如余冠威等之流不是沒有知名度就是沒有能力，連區議會也選不上還談什麼立法會選舉？梁家傑一去如果公民黨又派不出重量級人馬出選，必定引來其他黨派明星級參選人出選，屆時公民黨一席將危乎其危，但如果留下來，余若薇又不選港島，這樣等如白白讓出港島地盤，如何衡量確實費煞思量。

現在看來，九龍東將會是今屆立法會選舉中變數最大、競爭最激烈的選區，反對派各陣營各懷鬼胎去搶奪新增一席，隨時因分贖不均兩敗俱傷，只要建制派配票得宜，也有機會一爭長短。

「兩會」公共外交工作值得期待

邱震海博士 風凰衛視評論員

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日益崛起，在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實務外交之外，公共外交也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向國際社會更好地解釋本國的立場，提升本國的形象，從而達到化解國際社會的疑慮和阻力，最大程度地爭取構建一個有利於本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去年的「兩會」在公共外交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人們期待今年「兩會」在這方面有一個新的提升。

世紀風雲

春節過後，每年一次的全國「兩會」又即將來臨。去年中國「兩會」期間，中國外長和總理先後在記者會上就最近國際社會甚囂塵上的「中國外交傲慢論」做了回應，闡明了中國方面的立場和觀點。與此同時，「兩會」期間，由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辦的《公共外交通訊》第一期也正式出版，全國政協委員幾乎人手一冊。今年「兩會」的公共外交工作，依然令人期待。

公共外交：不是政治鬥爭

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日益崛起，在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實務外交之外，公共外交也正在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所謂公共外交，就是向國際社會更好地解釋本國的立場，提升本國的形象，從而達到化解國際社會的疑慮和阻力，最大程度地爭取構建一個有利於本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與實務外交相比，公共外交等於是國家的對外公關事業；但與實務外交相比，公共外交又有着一些相關而又不同的特點；其歸納起來是：

首先，對象不同。雖然實務外交也日益顯示其全方位的特點，但主要還是以國際社會的政界、企業界、文化界、軍界為主要訴諸對象。換言之，實務外交針對的基本上都是對某一國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其精英階層。但公共外交首先訴諸的應該是某一國家的民間社會，亦即對其決策或精英階層具有潛在影響力的廣大民眾。

其次，手段不同。如果說，實務外交在中國迅速發展期需要處理的是每天在實際層面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政治糾紛、貿易衝突、戰略敵意、突發事件等，其主要手段每每以政治鬥爭為主，那麼公共外交處理的則是作為上述種種矛盾之基礎的某一國家的民間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鬥爭顯然不是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甚至完全不應是公共外交的手段，而應代之以與某一國國民意的溝通。

換言之，在中國迅速發展的今天，如果說化解來自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意、猜疑、誤解或不安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那麼實務外交與公共外交所承擔的任務是完全不同的：實務外交可能須以鬥爭為主，其載體和訴諸對象首先是雙方政府及其立場；而公共外交則須以溝通為主，其載體首先是雙方民間及其認知。

而要做到這樣的從對象、功能到方式和風格上的區分，首先就要求人們對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種種情緒做邏輯、細緻的分析，亦即採用中國傳統政治語言來說，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思想對話 高屋建瓴

就一般政治層面而言，人們近幾年從西方政界感受到的，似乎更多是戰略猜疑乃至敵意（雖然其間也還需要做許多細緻的分析）；但這只是中西關係中的一個方面。作為西方對華猜疑和敵意的社會基礎，西方民間對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其實充滿了疑慮、不安和焦慮。但這種心理失衡首先不是敵意，而是人性、自然的反應。

從過去500年乃至1000年人類歷史的縱向來看，中國崛起是給人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件。過去千年，以500年前的西方崛



中國國家形象片亮相紐約時代廣場。

新華社

起和東方衰敗為標誌，東西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現了大換位。如果說，500年前西方崛起，東方衰敗是過去千年東西秩序的首次調適，那麼當歷史進入21世紀，當中國崛起在過去幾十年乃至百餘年日本現代化和「亞洲四小龍」的基礎上開始發生時，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東西秩序再次調適的新階段。

當然，這個調適的進程才剛剛展開，其更為深層的效應和意義將在未來幾十年乃至數百年得以清晰化。與相對表層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調適相比，東西心理秩序的調適是一個更為深層和微妙的進程；前者的內在邏輯和外現方式，往往會受到後者的不自覺影響和掌控。在這一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環節，客觀審視和理性梳理東西過去數百年的歷史及其導致的雙方心理秩序的現狀，就顯得十分重要和有意義。

抓住人性，重視媒體和知識界

這當然是一個思想史的話題，聽上去相對比較抽象和空泛。但無論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還是從中國化解西方疑慮和敵意的角度，中西方思想對話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高度，也應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制高點。有了這一制高點的高屋建瓴，人們才能從策略層面上有更多的思考和策劃。

從策略上說，最佳的公共外交不是由政府直接出面，而是訴諸民間團體；從方法上，針對西方世界的公共外交應抓住人性的部分，在人性的基礎上展開溝通和對話。在這方面，須十分重視對西方民間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界和媒體，針對一些西方媒體大牌專欄作家、西方知識界代表人物的工作宜在有策略的基礎上系統地展開。

但這些工作絕非傳統意義上的送往迎來，而須選擇國內學術、思想界和媒體界的有代表性的人士與之展開具有思想高度的溝通；所謂的對話也絕非站在自身立場上的各說各話，而是站在人類共同精神和思想屋頂上的對話。

中國迎來農民工的春天

張敬偉

幾年前就已引起關注的「民工荒」現象，在今年表現得尤其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中國經濟地圖的悄然變化，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的激烈競爭。

先是珠三角，繼而長三角，節後「民工荒」近年來成為常事。今年，發達地區的「民工荒」依然，據中國紡織協會的統計，珠三角區內人員缺口將在200萬人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是農民工加薪最多的一年，農民工工資性收入增幅高達17.9%，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工資提高了，農民工反而不願意到發達地區打工了。不僅珠三角和長三角要用加薪留人，連中西部地區也在以情感人。農民工的春天已經來臨？

我看到的。伴隨着產業升級，中國勞動力的價格

攀升是時代必然。在中國社會步入人均GDP4000美元的門檻時，低工資時代也不合時宜。農民工工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不加薪當然沒有吸引力。而且，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情境裡，農民工是城市裡的外鄉人，是被人蔑稱的打工仔、打工妹和游離於城市主流社會之外的「走鬼」。他們在城市不僅沒有象徵裡人身份的戶口，更缺乏教育、工作和社保的平權待遇。在此情境下，打工的城市不過是其打拚生活的流動驛站，難以讓農民工產生歸屬感，更談不上依戀。

「民工荒」在城市企業主看來，不過是單純的經濟和商業問題；在農民工則是攸關身份權利和社會待遇的尊嚴問題。所以，農民工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是自然之選擇。

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也在發展。尤其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內需市場的盤活，產業的承接和資金的轉移，中西部地區也需要大量的民工。至為關鍵的是，發達地區和後發地區的工資水平在接近。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而5年前東部地區工資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如今，這個差距變得更小。如果考慮到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物價水平，這種工資差距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不過，農民工當前只不過是剛剛感受到春天的暖意，意會到權利的感召，他們的春天裡還有料峭的寒風，他們的權利還未得到根本的保全。相比故鄉的眷戀和中西部地區的召喚，發達地區的工作環境、生活質量和工資待遇，還是有着無可比擬的吸引力。畢竟，只要地區差別還在，農民工依然還會像候鳥那樣「孔雀東南飛」。

因此，只有解決「三大差別」，實現全體公民真正意義上的平權待遇，農民工的春天才會真正到來。

「疫苗荒」突顯英國復甦路遙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一葉知秋」是指從一片樹葉的凋落，可以知道秋天的到來。比喻通過個別的細微的跡象，可以看到整個形勢的發展趨向與結果。英國近期流行甲型H1N1流感，感染人數達到幾十萬，一周的死亡人數最多就達到254人，鬧得市民人心惶惶。英國衛生防護局表示，死亡人數大幅攀升，是因為大部分人沒有及時接種流感疫苗。由於倫敦政府窮於應對經濟危機和安撫示威學生，根本沒有精力保證疫苗供應而出現「疫苗荒」。社會動亂、軍力衰退、學校經費困難等說明，英國的復甦已經變得遙遙無期。

兩大戰爭已經耗去英國的大部分資源，使倫敦政府不得不狠心削減各項開支，繼而引發學生示威、軍力自殘、科技滯後等系列災難。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最近不得不承認，根據英格蘭銀行的統計和分析，英國經濟復甦力相當不足，特別是新政府一棄前政府的經濟政策，大幅削減開支，為復甦前景增添了更多負面因素。目前，經濟出現滯脹的風險變得越來越大，持續出現的經濟快速下滑，成為80年來最為嚴重的經濟災難。無論是政府或者民眾，對經濟前景表示悲觀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警告，英國的經濟復甦已經「充滿陷阱」，要恢復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更加可怕的是，英國不僅復甦無期，還極有可能再次陷入嚴重衰退。根據英國新政府的緊急削減預算，到2015年，每年將減少320億英鎊政府開支，受此影響的除了政府部門、相關福利，甚至連教育、醫療和皇室也無法倖免。經濟學家認為，不顧後果的大幅削減開支和提高消費稅，加上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英國市民脆弱的心理已經變得「惶惶不可終日」。

英國商會的調查亦顯示，由於政府窮於應對「兩大戰役」，根本沒有精力顧及和支持脆弱的服務業，而服務業的滯脹狀態，必然拖累經濟的整體復甦。另一方面，歐元區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不斷湧現的財政問題，像傳染病一樣迅速傳染到倫敦，並對政府和企業帶來史無前例的影響。300萬失業人口，已經成為英國社會矛盾激化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發震撼社會的大爆炸。削減開支，使英國警察系統不得不實行大裁員，繼而引起可怕的人心渙散和警力空虛，進一步激化英國的危機。

缺錢令航母變無牙老虎

據美聯社報道，英國軍方在去年底的一份聲明中說，為了應對財政難關，「變賣軍事裝備」等變成軍隊的選擇。英國有兩艘新航母原計劃5年後服役，由於「差錢」，已經沒有資金和能力配備艦載戰機，使花巨資建成的兩艘航母成為有龐大軀殼而毫無戰鬥力的「紙老虎」。英國軍方的解釋是，艦載機成本太高，需要時向美國或法國租借艦載機比較合算，顯示英軍出現可怕的軍力「自殘」。航母是海上巨大的綜合作戰體系，其攻擊能力主要靠大量艦載機來完成。沒有艦載機的航母等於是沒有防護力的移動靶，隨時都可能招來滅頂之災。

近五百年來，英國靠開名世界的龐大海軍征服了全世界，永不落日的米字旗更成為法國帝國的象徵。但在去年底，英國首相卡梅倫卻不得不和法國總統薩科齊簽署了英法防務合作協議，破天荒地宣佈兩國創建聯合部隊，共享航空母艦。英法協議的簽署是在英國經濟出現巨大困難的情況下出台的，使協議有利法國。隨着英國財政危機的擴大，使英國本土和海外屬地的安全，變成控制在法國手中。英國媒體發文認為，卡梅倫雖然想挽救英國，但做出了非常愚蠢的決定。

單刀直入

農曆新年期間，導遊與旅客打鬥事件成為大新聞，再次令市民關注香港監察旅遊業的機構是否有有效運作。

筆者當然可以用統計數字指出旅客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但其實毋須如此做，只要將心比己，任何市民都會明白有效監管旅遊業的重要性。試想想，當二三十年前自助遊未如今天般受歡迎的時候，很多香港人往外地旅遊也是參加旅行團，也必定有被當地導遊帶到有關連的商舖購物。但在筆者印象中，並沒有聽過香港人在外地被迫購物，或是因為購物額少而與當地導遊大打出手。各位讀者可以想像，如果被迫購物，整個旅程是多麼的掃興。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已經老掉了牙，但香港為何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過去，本港的導遊接待入境的旅客，以歐美澳紐日本台灣為主，這些旅行團主要以觀光為主，尤其一些遠程的旅行團，團費不菲，導遊毋須用迫遊客購物維持生計。但過往內地的「零團費」購物團，以至現在的低額團費購物團，或許是事件成因之一。廣東人俗話「邊有咁大隻蛤蜊隨街跳」。一些到港的三天兩夜旅行團，所收費用不足一千，還包括交通食宿等，在香港物價如此高的地方，接待旅行社用羊毛出自羊身上的手段實在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當然，筆者不是說導遊迫遊客購物是「應該」，但香港要保障旅遊業聲譽，不能讓這些事件再發生。我們無法禁止深圳的旅行社訂定超收收費，但香港這邊卻不是絕無對策，就是訂定有效的執法和監管措施，避免

同類事件再發生。

將旅遊代理商註冊處升格為監管局

現時所有旅行社，包括接待內地遊客的旅行社，都必須成為旅遊業議會成員，方可領取旅行社牌照。這項監管旅遊業的措施起源自本地代理商收了團費後倒閉，導致消費者損失，因此法例最初只監管舉辦外遊的旅行社。到了約七至八年前，隨着內地到港團增加，政府才修訂法例，將接待入境旅行團都納入監管。然而旅遊業議會只不過是業界組織，始終不能代替一個真正的執法機構，尤其當自我監管效用成疑的時候。

因為，香港先要有的，就是一個真正的旅遊業執法機構。筆者認為，我們毋須再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因為我們有一個現成的旅遊代理商註冊處！理論上，此政府部門負責簽發及吊銷旅行社代理商牌照，「管理」旅行社、管理旅遊業賠償基金等，但實際上，這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部門，是一個真正的「註冊處」，只負責註冊。

筆者認為，政府應修改法例，將旅遊代理商註冊處升格為監管局，如證監或地產代理商監管局，將旅遊業議會的監管功能轉到新的監管局，包括監管旅行社及註冊領隊和導遊，嚴厲執法絕不寬貸。這個機構或應該由營運基金維持運作，至於旅遊業議會，仍舊可以保留商會的功能。